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于晓威,满族,1970年生,毕业于上海社科院暨上海作协首届全国作家研究生班。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曾任《鸭绿江》杂志主编,后辞去主编从事专业写作。在《收获》《上海文学》《钟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100多万字,出版小说集《L形转弯》《勾引家日记》《午夜落》《羽叶茑萝》等。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作品被翻译成日、韩等多种文字。

创作谈

前段时间因为搬家,在狼藉和尘封的资料柜中收拾旧物,发现了我10年前写作长篇《我在你身旁》的手稿和厚厚的写作资料。这些资料既有草创和构思的大纲、人物关系列表,也有近百张记录我无论吃饭时、出差时、睡觉时随手写下的小说语言片段的卡片。因为作品的故事背景涉及深圳、东莞和香港等,更有关于深莞地区和香港的建筑、流行服饰、汽车、化妆品、民生新闻、餐饮和酒店管理甚至人才招聘信息等等分类材料。还有我专门去这些地方体验生活与搜集素材的笔记。这些材料被我分装成八九个厚实的牛皮纸袋子里。我还记得我10年前,写完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字时,把它们放在柜子里的心情。似乎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与过去的生活动告告别。这种心情盖因为我浸淫其中的时间太久了,为之付出的也似乎实在太多。它们成为你的生活垃圾,只是这垃圾,证明你如何活过,所以不舍得扔去。

从最早的部分零星纸片和记录痕迹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其实还不止10年前,而是20多年前,我还在辽宁文学院读书的时候。它最早的故事前身来自一则真实报道。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女模特。是一根灵与肉、爱情与背叛、沉沦与激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和纠结的故事。后来我觉得,它的事儿有点儿类似美国电影《不道德的交易》。只不过,我后来还发现,就像我在作品中隐晦流露的那样,我的主题是在升华与叙写:“人生,不要总是寻找意义,而是要创造价值”。这个观点不仅是对笔墨最重的女主人公苏米的答复,更是对在城市中,处处寻找自己的妻子苏米的男主角许晚志的一个劝诫。也是对他们俩共同的一个劝诫,或者是对我们自身,对每个人,对每种生活态度的一种自我提醒。就比如,我这次搬家,发现家里各种储藏柜里,杂乱极了,我葆有无数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各种物品、纸片和用具。我知道在人间,有一种名词,我把它

陈克海,土家族,1982年生,湖北宣恩人。小说散见于《民族文学》《江南》《黄河》《红岩》《天涯》《清明》《莽原》《文学界》《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

多年前,虚构过一篇故事,大意是写父亲没结婚前,天天当着母亲的面吹牛,说他脸上的疤是被马熊抓的。其实,不过是在旧司城里面因为饭碗和女同学打了一架。

我从没感觉这样的编造有什么不好。年轻时我好像也喜欢虚张声势。没想到年近60的父亲真的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用包袱裹着半边脑袋,去杨老师的店里拿药。杨老师平时教书,就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卖铺,卖吃的,也卖药。一帮留守的老头老太太正在那里打牌。看见父亲进去,他们让了一下。等到看清楚是父亲,他们问:“你这是咋啦?”

“被马熊抓了。那天我跑到红旗界,说是扯点猪草,跟着沟走,从一个陡岩坎还没翻上去,一头马熊正坐在上面呢。我魂都吓掉了。它扑下来,我顺手把背篋一扔,它就撵背篋去了。狗日的,它还是扯脱了我半边耳朵。”“你没掉下去?”“幸好旁边有一截竹根。”

那段时间总有吓人的事。先是一个19岁的杀人犯流窜到了我们渔川。他白天躲进山里,晚上就出来敲后门,直喊快饿死了,要吃饭。年轻人都在南方打工,一帮弯腰驼背的老头老太太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平日常里不闻不问,正在构成更长的将来。县城派了13位民警,带着4条警犬来搜山,连个脚板印也没找到。没想到杀人犯的阴影还没消除,马熊又开始咬人了。

到了周末,我才想起和母亲说几句话。母亲在镇上给我哥看孩子,也是过年才回村里一回。本是不着边际闲扯,母亲突然说到:“自从你爸有了手机,每天晚上都会打过来电话,也不和我说话,说就要和家琪讲几句。我也不知道他和一个3岁孩子哪有那么多话。可到了八月十五,我才意识到,他有3天没打来电话了。打回去一问,他还是没和我

江湖夜雨十年灯

□于晓威

看成是某种哲学指向的范畴而不是心理疾病范畴,叫“储物癖”。妻子也对我说,“扔掉它们!”“扔掉它们,才能不断面向新生活!”她的意思与我作品里想要反映的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然而,我不舍得扔掉它们,不是说我刻意节俭,也不是说它们在如常日子中的某一天还能用到,不是了。它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被使用,甚至连看都不会经常看到它们,然而(还是然而),你扔掉了它们,“怎么证明你曾经这样地活过?”(川端康成语)既然证明不了你如何地活过,又何来“新”的生活?或者,你的“新生活”又有何意义?人生的许多意义之一,就来自于悖论。没有悖论,也就没有人生。虽然,我今天说的这个想法,恰恰也与我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成为一种悖论。

长篇小说《我在你身旁》当初构思以后,一放就是许多年。甚至我记得好像在比10年更早的年份里,《文艺报》曾经披露过我要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然而我一直没有动笔。我记得有位作家同行说过一个观点,小说,不能在完全构思成熟时才动笔,尤其是恒久地构思,因为你构思太成熟的话,对所有故事或细节的脉络太烂熟于胸了,所有的作品人物和人生走向都在你的脑海里无数次地预演过,你往往也就失去了写出它的动力和激情。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

作品写了大约半年之后,母亲去世。我立刻没有信心和心情写下去了。我曾说过,母亲在,我的哪怕点滴的写作成绩,都是一种沉甸甸的收获。母亲不在,我的再多的收获,也变为我在世俗中的一种炫耀。

突然有一天,我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妈妈妈弥留之际,她最关心的是什么吗?我问什么?妈妈说,她知道你的长篇小说写了一半,她说她什么挂心的事情也没有,就怕你这小说写不出来。然后大姐又说了一句:“你相信吗?你如果写出来,妈妈在天上一定会看到!”我默默摞了电话。我信。



陈克海

说什么,只是讲头闷。还是后来听见渔川的人讲,说是你爸被马熊咬了。”

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街上又怎么收开了摇钱树花,三四十块钱一斤。父亲也动了心。这比起在地里忙活一天要划算得多。他以为还是年轻时候,拿着砍刀就上了山。他砍了一天的树,那棵大树还是没有倒下来。天都要黑了,父亲有些着急。就去推。百十来米高的树突然倒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父亲被树一下子压到了一边。起初他只是觉得头晕。等了两分钟清醒过来,一摸耳朵,才发现掉了下来。血流得满头满脸。当时他就一个念头,想着怎么也不能在这荒山野岭中睡过去。我们渔川隔上几年就有人死在山里。

快80岁的奶奶哪见过这阵势,看见血糊一团的父亲,哭着去烧水。她以为父亲是要死了。父亲当时还算有点理智,要给杨老师打电话,说是去一趟旧司城看医生。杨老师是我们渔川唯一有车的人,尽管是辆货车。可我奶奶说,天这么黑,路又不好走,车子翻下去了怎么办?说完了,奶奶又讲,你们一出门,我天天喂四头猪,哪里提得动猪食桶?奶奶说了半天,意思是父亲在家待着就行,毕竟我爷爷还懂一点中草药。

“最可笑的是你爷爷,看到你爸耳朵掉下来了,用一块胶布粘着。你爸天天躺在沙发上,姿势又不对,等到稍微好一点,才发现耳朵掉了。他和他人讲他被马熊咬了,居然也真有人信。你爸也是没办法,他哪敢讲他是在砍树?树在你舅舅的山里,要是你舅舅知道你爸青天白日砍他的树,还不把你爸恨死。”

每回听父母说这些往事,都迫不及待记录下来,好像写下那些荒腔走板的变形,就能平息不安,就能求得宽恕,就能更多接近真实。总是这样。

父亲和他的马熊

□陈克海

严英秀,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出版《纸飞机》(中、英)、《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获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

我从不曾预料到2018年在我生命中的特殊性。一本书的即将问世,一个人的遽然离世。这看上去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而且根本不具备等量齐观性。但在2018年,它们接踵而来,缠杂交错,横亘在我的今天,并且漫延不绝,正在构成更长的将来。

一本书,就是这本《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我已经有五部书了,都是小说集。很久以来,我想有一部散文集。我一次次地想象那些散文集结出版的样子,它的颜色,芳香,它散发自珍的重量。但人们已习惯了我是个写小说的人。所以,在2018年,当我以散文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那简直是一个意外。却原来,念念不忘,真真有回响。

然而,得知这意义非凡的喜讯是在母亲的病床边。我的母亲,一个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藏族妇女,她不曾留下陪我吟诗涂鸭的亲子记忆,但当我拿起笔,她始终是我所有文字中那个最强大的存在,尤其在散文这种极自我的文体内。暮年时,她常常摩挲着我的小说集,双眼闪亮。事实上,她并不知道书里写着什么,单是女儿写了书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她无限欣慰。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的女儿成了“写书的人”。我曾告诉她,这些书是别人的故事,将来我会出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她。

就是这样。知道我可以出这本“有她的书”之后14天,母亲走了。然后,在她出殡的第二天,我赴京参加了散文集的改稿会。再然后,在她七七祭奠的第二天,因着这本散文集我随中国作协采访团去了南海三沙市永兴岛。天涯海角,心神逍遥,今夕何夕。我以为我已饱经沧桑,我以为我已对生活摸爬太多,可是,当比辽阔更辽阔的大海涌向我的眼睛,当比激荡更激荡的大风吹起我的头发,当比孤独更孤独的风景靠近我的足迹,我突然于身心深处感到了一双无处不在的抚慰之手。那样的手,那样的温热,此生已然别过,为何会在某一刻悄然相逢?

大海无边无际,消释一切,包容所有。大海让一个刚刚痛失母亲的人,

就算时间带走了所有的岸

□严英秀

失而复得了唯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感到的大欢喜、大善意和大委屈。海岸线上,万道霞光,一轮崭新的日出。生命的登场有着那般磅礴的欢喜,如同它谢幕时庄严的静穆。我仿佛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关于自然万物的那些朴素真理,谛听到了天籁交响。我是那么真实地触摸到了自己。我已失去了世间最珍贵的,我还要遭遇更多的失去,但我正在路上,我必将不断地被馈赠,被壮大,被丰盈。

很大的风。风从海上来,吹起了无穷大无穷远的蔚蓝。海蓝到剔透如镜,蓝到深不见底,仿佛全世界的蓝都集中在这里,仿佛这无边无际的海域也盛不下如许多的蓝,眼看着这蓝冲撞到了天边,眼看着这蓝侵占了全部的天空,海天浑然一色,海天蓝到让我无语哭泣。无与伦比的2018年,所有的岁月之殇,终于在南中国一碧万顷的长风中,哭出了海也似的泪。

我知道在这样一篇创作谈里,抛开创作话题回顾如此私人的生活境遇,是不适宜的。我一己的执念,我的褊狭之笔,没有沉淀和提炼,缺乏结晶和升华,尚未掘进到人类公共情感和经验的幽深,尚未抵达文学性的高度。但关于这本书,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些。仅仅是在去年,我还在《致母亲》中咏叹:“走进榆叶梅的花海,我猝不及防跌进了修辞的包围中——它多么像你的一生。那么多的春天,那么多的捧出。”而此刻,又一个春天呼啦啦全开了,我却被一枚钉子钉住了心和口。

如此,也必须重新启程。走下去,写下去。是的,不能被述说的生活,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是无法想象的。写散文还是小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如此美丽如此伤痛的人世,我怎么可以停止歌唱和哭泣。我怎么可以说:我一无所有,我两手空空。

而这本《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之于我,是永远的,唯一的。时间带走了所有的岸,那个曾经的港湾已彻底湮灭,但尘归土,土归土,我在这本书里,在文字的救赎中归于和母亲十指紧握,永不分离。这浩荡的悲喜人生,这纷纭而至的命运,从此我不再轻言放手。

绘写心中的世界

李一鸣

于晓威两进鲁迅文学院,第二次“回炉”鲁院研修时,我还在鲁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印象里的晓威瘦劲、挺拔、真诚、朴质,内敛而又蕴含激情。离开鲁院后,在微信朋友圈,使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的油画作品。他的多维才华和超拔品位,为人称道。

原来他并没有离开文学,其实他一直处于创作状态中。于晓威的这部长篇小说《我在你身旁》便是最好的证明。

我感觉,这部小说具有独到品质。首先,这是作者以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一部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反映了中国当代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风貌、世道人心,具有时代画卷的品质。文学具有时代逻辑,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独具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时代赋予文学故事以发生背景、社会风景、生活场景和人生情景,时代必然给文学作品打上独特的印记。晓威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时代环境中淬炼,对社会转型中的人事精心描摹,呈现了特殊时期时代生活的特质,绘写出当代中国的精神性气候。

其次,这部长篇小说,也体现出晓威坚守创作的人学逻辑,力在开掘人心、挖掘人

性,体现了关切人类内心世界和生存处境的品质。作品细细描绘了社会变迁的特殊时代境遇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场景、生存图景与精神困境,体现了作者密切关注社会现实,聚焦社会发展趋向,揭示人生本相,期冀改变社会现状的焦虑和担承。小说对广阔社会生活的洞察力敏锐,对人生的思考丰富沉重,对幽微人心的刻画鞭辟入里,具有相当的深刻性。

还有,这部长篇小说笔力雄健,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有平静如常的叙写,有出乎意料的奇遇巧合,有短暂的喜剧故事,有沉痛的悲剧冲突,结构多线推进、纵横交错,情节波澜丛生、回味无穷,具有成熟的审美把握能力。

晓威的这部长篇小说,值得赞赏的还在于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有人说,写小说就是写人物。这部小说塑造了苏米、许晚志、龙乔生、陈妙、李公明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是中国当代这个特定历史阶段才会出现的人物。正是以这些人物的精神性气候,小说所描述的庞杂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才得以实现。发现眼中的生活,绘写心中的世界吧。

沉入深水区前

黄德海

每个人都有向上的愿望,可在这抗攘的人世间,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而直接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对大部分未必自觉的人来说,向上愿望的起起落落,就形成了人生的坎坎坷坷。陈克海《简直像春天》里的六个小说,写的就是向上愿望在人间崎岖起伏的样子。说得确切些,陈克海这个小说集里的人们,都面临着人生的第二次向上可能。

一个年轻的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个机关女性开始厌倦重复的日常,一对几乎生计淹没的夫妇企图挣扎出来,一个科员盼望着中年变法,一个丧妻者注视着年轻女性的温情,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无意识做着改变……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些不纯粹的爱情,不彻底的表白、不干脆的决断、不真诚的言语、不得已的分别……瞥眼看过去,差不多都是沉入深水区前的无意义挣扎,做不得数,也当不得真,不过,似乎也并不是毫无用处。尽管可能在挣扎中陷入得越来越深,可挣扎本身好像又带来了那么一点不同,跟完全忘记了向上愿望的人,有了那么一丝不太说得明白的差异。

小说中的人物,经历的都只不过是平常的人生,每个人都有些愿意或不愿意跟人提起的故事。那个年轻的女孩,“运气不好,竟然招惹上了满嘴是蜜的老男人。一来二去,习惯了,竟多了份贪恋”。那个坐久了机关的女性,“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她曾经讨厌的那一类人,自以为,爱给人说教,显摆似而非自己的人生看法,好像如此一来,就能证明她的人生不是那么苍白”。那看不到生活尽头的两口子,“他那么拼命地亲着她,无意义地重

复着无数次的接吻,就像人们在绝望的时候,并不知道绝望,只是不断地把香烟放在嘴上吸”。尽管生活的洪流在绵延的烟盖上似乎消除了凶险,可那能把人卷进漩涡的力量没有丝毫减弱,猛兽般的獠牙每每在人喘息之间闪现出来。

就是在这样日渐疲沓下去的人生当中,人不断骗取着自己的信任,做着绝望的挣扎,付出无奈的爱意,乞求善意的安慰,涌起挫败的嫉妒……虽然时刻准备着从平庸的生活中一点点挣扎出来,却不过是芜杂烦琐生活中卑微的人生。

这微乎其微的变化,清除了一点儿淤积,驱走了一点儿无奈,带来了一点儿心劲儿,疏通了一点儿道理,甚至改变了一点儿容貌,都谈不上是值得提起的事情,甚至在这之前,向上的愿望带来的是更多的艰辛,人突破了很多原本不必突破的底线,陷入了更为可怕的困局。但生活没有因此而停顿,人终于借助这困局明白了些什么,此前的种种也就不完全是徒劳,人在这艰难中一点点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有意或者无意,陈克海这本小说集中的人物,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一个小说中的配角成了另一个小说的主角,一个小说中的主要情节成了另一个小说的引子,一个小说里的意外成了另一个小说里的必然。就这样,《简直像春天》差不多编织出一个属于中年人的命运共同体,虽然挣扎之后,他们也“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可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显现了向上的愿望——这是属人的卑微,也毫无疑问是属人的骄傲;这是小说的卑微,也毫无疑问是小说的骄傲。

严英秀的至真至勇

郑 函

读严英秀的这本《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并不轻松。文字绵密缜密,意识流淌跳跃,仿佛一片密林中追寻一只野鹿,不容半点分神。不仅如此,阅读渐进,忽然产生巨大的惶恐:我怎么能如此深入地闯进了她的内心。严英秀的自我如此强大,这本散文集分为“我所栖身的生活”和“我所经历”两部分,勇敢地以我观物、抒己之怀,在这个追求“取悦”和“目的”的年代,这本任性的“自白书”越显弥足可爱。

严英秀的写作驱动力是内向的,看到一树繁花的波澜、一场倒春寒时与女儿的较量、一个小城、一幅小画,都可以成为思绪生长的锚点,她以丰富细腻的内心情怀,任由这些枝桠繁茂。在严英秀的字里行间,甚至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在思绪浩瀚中捕获那些闪念,如何将它们细细品译,又如何将它们流淌到指尖。她写作的目的同样也是内向的,母亲离世的悲痛、创作面对的困惑和质疑,心敏感如她,必然需要一个出口才不至于被自己击溃,写作此时变成了自我抚触、阐释与和解,“唯有写出来,记下来,我才能走过我自己”。正是这样勇敢、真我的赤诚相见,使她将这些一己的独特感受变得共通,使她的思想和观点超越自我书写,成为对生活结晶的描摹。严英秀将这本书献给自己的母亲,母亲过世恰与她入选的这次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开展系列活动的重叠。当时因为这项工作我也多与她见面、联络,在读到记述那一段时期的《天之大》时,才明白面色憔悴、强颜欢笑背后一颗正在恸哭的心。母亲和女儿是严英秀“所栖身的生活”的主题,她在想起女儿时就会想起母亲,在面对母亲时又不禁念起女儿,“这样生生不息的交错,是多么令人伤感又使人振奋的生命的奥秘啊,一个人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一条

路的尽头总会生出另一条路,四季轮回更替从死无死,万事万物都在既定的轨迹上行走”。她试图理解的,不是女儿或者母亲,是女儿给了她为人母的体验,她又用母亲去照映自己的未来,二者交叠在一起,归根结底探索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

一个真诚、忠实于自己的写作者必然是勇敢的,不仅在勇于将自己的苦痛和思考剖开展现给世人,更在于写自己想写而不去满足他人的期待。在严英秀的文字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读书的人、一个爱花的人……而最为人所瞩目的“西部”和“藏族”两个标签却要排到十几名之后。批评家对她的质疑在所难免,在《在西部写作中》,严英秀直言不讳:写,是一种迎合;不写,才是坚守。“当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渐行渐远时,我们的文学该如何的西部?我们是表现这古老的西部大地和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变异和生长,在持守和嬗变中再创造出真正的反映母亲大地的现代诉求的新的西部资源,还是永远地开掘取之不尽的西部资源,让自己的文字成为类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旅游中那种满足了东部人的优越感和猎奇欲的民俗表演”。

我认同她,也敬佩她。作为“甘肃八骏”、“藏族作家”,人们认为在这个框架下获得了荣誉与关注,就理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所以她的辩驳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一种推脱责任和数典忘祖。但是一个真实生活在这个环境和文化中的人,如实地反映生活与自我,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回避,让土地与民族所赋予的精神自然流淌,“就算不以地域生活为显性的主题元素,也都会毋庸置疑地留下自己植根故土的明显胎记”。这何尝不是对当代藏族、当代西部的直面和表现,这样的真实交给时间去审视可能更有意义。



严英秀